

壹、前言

教育是重要的社會與文化事務，清晰的教育理念是完成明智教育工作的先備條件。因此，對於教育理念的分析、釐清、討論與檢視等，應該是任何國家、社會、學校與教育者的中心任務。教育哲學家的專業責任之一，即是對於教育理論與實務進行嚴謹的哲學思考，期待成果能夠有助於實務工作者（李奉儒，2004）。基於此，學者有必要釐清教育領域若干觀念的錯誤，例如，就主體的爭議而論，臺灣自教育改革以來，就有強調主體性的教育，亦即教育排除政治干預，並重視學生的自主權。然而，這只不過是用另一個主體來取代原先的主體，就好像有些女性主義要打倒男性霸權，然後取而代之一樣，兩者都沒有正當性（蘇永明，2006：263）。是以，我國教育改革活動的進行不能只重視教育實際問題的解決，也要重視教育理念的革新。隨著教育改革浪潮的來臨，各種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案模式，正不斷地在教育體制內外蓬勃發展，而網路的快捷和複製科技的突破性發展，也都使得知識的建構更為多元化與數位化，這些都會合理地威脅教育哲學的知識體系，因此，教育哲學的研究與教學也不宜抱殘守缺。至於如何系統性地引介知識，引出合宜的思考及激發師生之間的教育情懷，則是教育哲學教學者所面臨的困難挑戰（簡成熙，2004：119）。目前我國正在進行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活動，由於在教育政策制定的過程中，忽略了教育哲學專家意見的徵詢，導致教育政策決策的失當，引起許多學生、教師、家長和社會人士的批評，足見教育改革的推動不能忽略哲學的思考，以往治標不治本的作法，應該徹底地改弦更張，才能因應國家社會的需要，提出合理可行的教育政策，達到教育改革的理想（梁福鎮，2006）。面對這些問題，教育學者要尋找傳統價值、釐定創新方向、認清領先優勢和痛改陳疴宿疾，才能促進臺灣教育學術的發展，找到我國社會整體文明未來的出路（馮朝霖，2006）。

教育改革主要在使個人具備探究能力，開啟自然中的理性秩序，解除傳統、宗教與迷信的桎梏，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與解放，例如，掃除文盲運動、自然主義的教育運動和泛愛主義教育運動的教育改革，宗旨雖然未盡一致，但是，都在透過教育的活動，點燃人類的理性之光，使人類能夠勇於運用理性，以控制自

然與社會，而躋斯土於天堂（楊深坑，1996：1），因此，世界各國無不重視教育改革。然而，教育改革如果沒有理論的指引，實施的結果勢必成效不彰，所以，教育改革理論的建立相當重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改革教育學」的研究乃應運而生。傳統的定義主張，改革教育學（Reformpädagogik）是一門研究十九世紀以來重要教育改革運動的學科，這些重要的教育改革運動包括藝術教育運動、鄉村教育之家運動、工作學校運動、青少年運動、學校改革運動、社會教育運動和進步教育運動等（Böhm, 2000: 443-444）。經過七十幾年的發展，改革教育學的定義已經有所改變。到了今天，改革教育學是指一門從教育反思的觀點出發，探討歐洲啟蒙運動時期迄今，各國重要的教育改革運動和教育改革思想，提出教育改革理論，以改善教育改革實際的學科（Benner & Kemper, 2001: 9）。改革教育學是「普通教育學」（Allgemeine Pädagogik）領域中的一門學科，兩者關係非常密切。如果從教育科學的演變來看，普通教育學雖然是一門「常規教育學」（Normalpädagogik），但是，由於教育學者不斷地進行論辯，使得普通教育學在概念上不斷地推陳出新，因此，普通教育學也是一門改革教育學。從 T. S. Kuhn科學理論的觀點來看，如果普通教育學是一門「常規科學」（normal science），那麼改革教育學就是一門「革命科學」（revolutionary science），兩者不斷地循環，促成教育科學的進步（梁福鎮，2004）。D. Benner¹（1941-）曾經在其改革教育學時期的著作中，從實踐學的觀點出發，應用哲學分析的方法，探討德國教育改革運動、國家教育政策和教育科學理論的發展，釐清一些錯誤的教育改革理念，探討國家教育政策，闡述教育科學的演變，緊密地結合教育理論與教育實務，分析許多教育改革運動成敗的原因（Benner & Kemper, 2001, 2002,

¹ Benner 是德國當代非常重要的教育學家，1941 年出生於萊蘭的諾伊維德鎮，1965 年獲得奧國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1970 年任教於波昂大學、1973 年轉到敏斯特等大學，曾經擔任德國教育科學會（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）會長（1990-1994）、德國柏林洪保特大學第四哲學院院長，2004 年獲頒為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榮譽教授，現任波蘭華沙大學教育科學講座教授。Benner 不僅位列「德國名人錄」（Wers Wer in Deutschland），擔任著名刊物《教育學雜誌》（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）的主編多年，並且創立了實踐學取向的教育學，在德國教育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（Böhm, 2000: 61-62; Lenzen, 2001: 254-276）。